

## 【学界往事】

□智效民

## 民国时期的铁路专家凌鸿勋

凌鸿勋除了致力于铁路建设之外,还在台湾担任石油公司董事长20余年,在容易滋生腐败的铁路和石油两大领域,凌鸿勋的清廉品德和敬业精神可为表率。

今年4月15日是凌鸿勋先生诞辰121周年。凌先生是广东人,由于他在1949年以后去了台湾,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遗忘了。最近在网看到,标志着新疆正式进入高铁时代的兰新高铁乌鲁木齐至哈密段开通,让我想起了凌先生为陇海线和粤汉线所做的贡献。

凌鸿勋1894年出生于广东番禺一个书香世家。凌先生表示,许多人把“凌”字误写为“凌”,他只是付之一笑,并开玩笑说:“我不在乎这一点。”由此可见,当年的这位“理工男”还是颇为幽默的。

据凌先生回忆,他的父亲曾经考取举人,只因在进京参加会试时多次落榜,才在家乡当了一名教书先生。教书匠收入很低,他们家曾经到了没有隔夜粮的地步,午餐不举火也是常有的事。凌鸿勋幼年接受私塾教育,后来考入广州府中学堂就读。当时京汉铁路已经通车,修筑粤汉铁路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,于是广东绅商组办粤汉铁路公司,在民间集资修路,凌鸿勋虽然家境贫穷,却不得不交上一元,成为“起码股东”。这件事居然成了他与铁路发生关系的开始。

1910年凌鸿勋从广州府中学堂毕业,正好上海高等实业学堂(南洋大学的前身)前来招生。该校由清末重臣唐文治主持,因为不收学费,所以凌鸿勋选择了这所学校。

1914年凌鸿勋从该校毕业后,本来想回广州找一份工作,却未能如愿。正好美国桥梁公司要在南洋公学招收两个实习生,凌鸿勋本来对此不感兴趣,但是在唐校长的督促下,他终于应聘去了美国。在美国,他与胡适、张伯苓、任鸿隽等留学生皆有来往,并发起组织了“中国工程学会”。

1918年凌鸿勋返回中国,经唐文治介绍进入交通部工作。两年后,他秉承师(唐文治)命回母校任教,并担任土木科代主任。这时的南洋公学已改名为南洋大学,不久唐文治校长因年迈多病辞职,交通部任命凌鸿勋代理校务,当时他年仅26岁。但是没过多久,南洋大学就归入新成立的交通大学,于是他又返回交通部工作。

在交通部可以学为所用,凌鸿勋非常喜欢这份工作。然而,变化莫测的政治局面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。1922年4月,新上任的交通部长不问青



凌鸿勋

红皂白将他免职,他举家南迁,重新回到上海南洋大学执教。两年后段祺瑞上台执政,交通部因为再次改组,致使南洋大学校长辞职,于是交通部任命凌鸿勋接替校长职务,这一年他才30周岁。随后,他在校长任上经历了江浙战争、孙中山去世、五卅惨案等一系列重大事件,均安然无恙。直到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以后,才被迫辞职,远赴广西梧州,在市政府当了一名工务局长。

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当局为了实现孙中山提出的铁路计划,组建了以孙科为首的铁道部。1929年年初,经一位外国专家推荐,孙科邀请凌鸿勋前来任职。同年6月,凌出任陇海铁路工程局局长。

陇海铁路既是一条贯穿中西部的铁路干线,也是新亚欧大陆桥(东起连云港西到鹿特丹)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条铁路的修筑最初是由盛宣怀在1903年提出来的,原计划四五年内完工,但由于款项不足和内战不断,直到凌鸿勋上任的时候,该路只完成江苏海州(今连云港)至河南灵宝部分。这段铁路还不足全线的三分之一。

凌鸿勋上任后,本来计划将陇海线向西拓展,经西安一直修到兰州,但是没过多久就爆发了中原大战。中原大战的主战场就在陇海线一带,因此勘察工程被迫停顿了一年左右。1931

年年初,陇海线灵宝至潼关段开始施工。潼关西傍华山,北临黄河,周围谷深崖绝,素有“关门扼九州,飞鸟不能逾”之说。尽管如此,勘察工程在凌鸿勋的领导下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顺利完成任务。

正当凌鸿勋准备在陇海线大显身手的时候,新上任的铁道部长顾孟余将他召回,委派他去湖南负责打通株韶铁路。株韶铁路是粤汉铁路的中段,粤汉铁路自1898年开工后,直到1915和1918年,才分别完成广州至韶关和武汉至长沙的路段。剩下的株洲到韶关路段,则因经费等原因被长期搁置。

凌鸿勋与顾孟余素不相识,他不知道为什么对方会选择他担任这一重要职务。见面以后他才知道,顾之所以这样做,是因为他是长期在外做事的广东人。因为是广东人,他容易被广东方面所接受;因为长期在外面做事,所以他在广东没有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,也不会只考虑广东方面的利益。另外,顾孟余还对他讲,华北情况紧张,说不定会有事变,因此要尽可能提前完工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凌鸿勋主要的担心就是钱的问题。为此顾孟余对他说,这个问题不需要他考虑,因为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,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将全部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,并用于交通和教育事业。这就为铁路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。

1932年年底,凌鸿勋正式走马上任。随后,他将株韶铁路工程局总部从广州迁至衡阳,并设在彭玉麟故居。前几年我独自去湖南旅游,还到过这个地方。彭玉麟故居又名退省庵,就在湘江东岸。门前有一副对联,上书“水得闲情,山多画意;门无俗客,楼有赐书”,概括了周围的环境和主人的情趣。

经过三年多的努力,株韶铁路于1936年4月下旬在太平里车站接轨,这意味着粤汉路全线正式开通。对于这样一件大事,凌鸿勋没有举行任何仪式,也没有大肆宣传,而是亲自打下了最后一根道钉。凌鸿勋除了致力于铁路建设之外,还在台湾担任石油公司董事长20余年,在容易滋生腐败的铁路和石油两大领域,凌鸿勋的清廉品德和敬业精神可为表率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,著有《长袍与牢骚》等书)

经字大于斗,北齐人所书。  
千年风韵在,一亩石砰铺。  
阅历久愈久,摧残无代无。  
只今逢解放,点不再模糊。

这是郭沫若先生1961年5月8日游泰山时写下的《访泰山经石峪》,短短40字,概述了泰山经石峪《金刚经》的刻写年代、占地面积、历史沧桑和解放后的保护情况。

泰山斗母宫西北约四百米处的经石峪的缓坡石坪上,镌刻着北齐天保年间(551-559)的大字《金刚经》,又名《泰山佛说金刚经》,该经刻字面积约2064平方米。因字大径尺,即字径平均约在50厘米左右,大多数字竖高约35厘米,横宽40-60厘米,故被康有为称为“大字鼻祖”,被包世臣称为“榜书之宗”。杨守敬的《学书述言》中则称颂曰:“肇窠于北,此为极则。”

南北朝是历史上著名的尚佛时代,不但建造了大量的寺院,还建佛窟、塑佛像、绘壁画、抄佛经。与北齐(550-577)对峙的北周武帝(543-578)宇文邕时,因佛教势力过于强大,就于建德三年(574)下令推行灭佛政策;建德六年(572)北周灭北齐后,仍令毁灭齐国境内的佛教。这就是佛家所说的“四大法难”之一。灭佛期间,僧侣财产被没收,佛塔被毁坏,佛经被焚烧,僧侣们或还俗,或逃往山林。道宣《续高僧传》记载僧惠思的话说:“我佛法不久应灭,当往何方以避此难?”反映的就是当时的情况。鉴于大量佛经被焚烧的事实,为了弘扬佛法,使佛经能“逢劫火而莫烧,对炎风而长住”,以安道壹为首的僧人们抱着“缣竹易销,金石难灭”的传世想法,开始了在山崖上凿刻佛经的巨大工程。邹县四山(铁山、钢山、尖山和葛山)摩崖经典和本文讲述的泰山经石峪《金刚经》,都是当时摩崖刻佛经的代表。

当然,关于泰山经石峪《金刚经》的书刻者,历来也有不同的说法:除了不着边际的王

## 【碑刻漫话】

榜书之宗：  
泰山经石峪《金刚经》

□杨加深

羲之说和唐人说之外,目前较大的争议有三种,之所以相持不下,是因为这三种观点都使用了同一种推断方法——比较法,而且,他们所争议的所谓书丹者也都是北齐人。罗列如下:一是明代孙宏宏认为的韦子琛说,原因是经石峪《金刚经》的笔法与邹县北齐韦子琛刻经如出一手;二是清代聂剑光主张的王子椿说,原因也是《金刚经》与王子椿书丹的徂徕刻石经如出一手;三是现代人王恩礼、赖非主张的安道壹说,原因是此刻石与北齐僧人安道壹题刻的邹县铁山摩崖经刻如出一手。北齐时期的安道壹,就是灭佛期间隐居山林的僧侣之一,也是中国古代著名“四大僧侣书法家”之一,通过综合比较,我更倾向于最后一种说法,因为经石峪《金刚经》与安道壹的笔迹最像,况且安道壹还是个当地人。

泰山经石峪《金刚经》所采用的经文,即后秦鸠摩罗什所译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,原本5127字,但当时刻在经石峪上的却只有2799字,而且,此刻石最后第15行的十几个字,只有双勾描红的轮廓,并没有真正地刻写。这透露出一个信息,即这个佛经的刻石工程是被迫中断的,而中断的原因,工程浩大是其一,但更大的可能是迫于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。

本来就未刻完的一部佛经,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、洪水冲刷和数百年的游人践踏及反复锤拓后,现存的文字,包括可释读的残字和双勾字在内,也只有1069个了。需要说明的是,民国十八年(1929)曾经有一个960余字的统计,但其中说的是完整无残缺的字。

为什么说此刻石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洪水冲刷呢?原来,此前经石峪《金刚经》的刻石之处,正好处于泰山一处瀑布下,所以,千年来,此刻石长期被大水覆盖。为使其免受冲刷,当地有关部门于1967年在崖北筑砌石坝,并更改了水道的位臵;1982年又在石坪周围筑石栏,对该刻石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。

该刻经之字体,楷书中兼含篆隶笔意,字势也各具情态。用笔圆转,结体宽博;章法密而不紧,厚而不塞。其静穆雍容、萧散冲和的宏大气象,俨然能我们将我们带入一种幽深清远、超凡脱俗的佛家境界。这正如美学家杨辛先生所说:它“显示了佛法无边的雄伟气魄”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泰山经石峪《金刚经》的书体与风格,是迥异于同时期的魏碑的,它不险不怪、佛意十足,是一部内容与形式高度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。宋代的苏轼曾提出过这样的书法审美思想:“真书难于飘扬,草书难于严重,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,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。”清人杨守敬说:“以径尺之大书,如作小楷。”康有为也说:“试观《经石峪》,正是宽绰有余耳!”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副院长,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)

## 【读史札记】

□王乾荣

## 罹难当学苏东坡

当下书店里、网络上,教人如何对待人生的“心灵鸡汤”汗牛充栋,那么多劳什子,依我看,都不如苏东坡先生写于1000多年前的这首《莫听穿林打叶声》。

我最喜欢的一首词,是苏东坡的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。词曰: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
这首词,道出了苏东坡深切的人生感怀。东坡先生做过大官,曾任礼部尚书,部长级。写这词时,他已被贬谪黄州,充团练副使,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吧。他的贬官,是因为所谓“乌台诗案”——文人嘛,他不过写了几首不满时政的小诗而已,就被如此严厉惩罚,堪称一桩文字狱。

东坡先生处于人生低谷,正倒霉呢,可从这首词看,他却没有一点沮丧情绪。

词前小引说,早春三月,初七那天,苏东坡与友人同去一个叫“沙湖”的地方,“道中遇雨,雨具先去,同行皆狼狈,余独不觉,已而遂晴,故作此词。”他们一行,本以为不会下雨,让人把随身携带的雨具拿走,却偏偏碰上了雨。大雨滂沱,人人成了落汤鸡,别人或许怨天尤人,唯独苏先生没事人一般,尽享雨中之乐。一会儿老天放晴,别人也许忙于清理打湿的衣衫,苏东坡却文思泉涌,写下了这首传诸后世的不朽词作。

您瞧这苏东坡先生的旷达劲儿:别

听那穿越树林、猛烈敲打树叶上的哗哗雨声,咱们在这大雨中,何不欢呼着、吟唱着慢慢前行呢!虽正罹磨难,但是灾祸正如狂风暴雨般袭来,“穿林打叶”。一“穿”一“打”,极写“雨”之迅猛。换别人,早蔫巴了,“同行皆狼狈”嘛,可苏东坡就是特别,他总是毅然坦然地面对各种突变。这不光是写他在大自然中遭遇暴雨袭击时的心态。面对政敌,苏东坡也毫不妥协气馁,他把那些加诸己身的不实之词当成了“蚂蚁蛄叫”,或当成耳旁风一般,“莫听”,照样“耕”自己的“田”,走自己的路。“何妨”,即任他什么玩意儿,也挡不住“我”快乐前行的步伐。

在林中泥泞道路中跋涉,拄在手里的竹杖,登在足下的草鞋,轻快得胜过高头大马,请问谁有这般奇巧的感觉和浮想联翩?也只有伟大词人苏东坡。贬官算什么?像卑微的渔夫一样,穿件蓑衣,弄潮戏汐,风里来浪里去,无欲无求,也能潇潇洒洒度过一辈子。请问谁有如此达观的胸怀?也只有不怎么伟大的天真政治家苏轼。在官言官,造福一方;在民则民,不弃理想。“谁怕”,只两个字,尽写苏东坡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所在。

他知道,任何风雨总会过去。果然,“已而遂晴”。虽然没有艳丽的彩虹显现,“春风”依然“料峭”,令人“微冷”,即

仍有一点儿冷飕飕的感觉;而在苏东坡看来,这冷的感觉,却令人清醒。再说,眼前山头上,不已有阳光斜照了吗?那日光虽“斜”,却也“迎”着咱们,给人以光明和温暖。风雨过去了,阳光洒下来,心情于是更加豁亮乐观。如今媒体老说哪个影视美女帅哥“阳光”云云,不过是略表其面,苏东坡的“阳光”,可是生发在心窝里的。

苏轼仕途多舛,却为官清廉,也不是什么官迷,更勇于坚持理想。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。”回头看看走过的崎岖艰险道路,确实不无萧瑟,但“我”还是要回到“我”的原路,即“我”一贯坚持的方向——只是因为那温暖的“阳光”在胸!如此,即使在阴暗的“风雨”中,道路也是明亮的,能促使人奋不顾身前进。这是说,无论风云变幻,不管天气或晴或阴,这“阳光”都普照着他的人生,更令他有了一种超然物外的大彻大悟,即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——他不觉得有什么风雨,而即便是暴风骤雨,也一如晴天。这是多么积极向上的人生箴言!

当下书店里、网络上,教人如何对待人生的“心灵鸡汤”汗牛充栋,那么多劳什子,依我看,都不如苏东坡先生写于1000多年前的这首《莫听穿林打叶声》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杂文家)